下载日志已记录，仅供内部参考

AI 如何冲击税收？

定期报告

——AI 与宏观系列之二

频率：每月

伴随 AI 技术的快速普及与深度渗透，现代税收体系正面临全新挑战。纵观历次工业革命，前三次技术变革依次推动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跨境消费税征管框架的建立与完善；税制变革的响应周期，也由最初八十余年缩短至 10 年左右。AI 冲击的核心落脚点在于劳动税基，就业岗位收缩、劳动者收入分化，会直接削弱劳动相关税收的稳定性。通过 AI 暴露度、劳动份额、劳动税依赖度与财政脆弱度四项指标综合评估，德、美、日三国税制风险敞口居前，新兴经济体承受的冲击相对更小。全球化与大国产业竞争背景下，立足现有税制框架开展规则完善，或是现阶段更具可行性的应对方案。不过，也不能完全排除财政压力较大的美欧等国会推动新税种的开辟。

- **历次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税收？**如果把 AI 视作新一轮具有变革性的通用技术浪潮，那么历次技术革命重塑税收体系的经验，将是理解当前时代变化的重要历史参照。劳动、资本、消费构成现代财税体系的三大税基。**第一次工业革命拓展了个人所得的潜在税基**，英国 1842 年率先开征个人所得税，奥地利（1849）、意大利（1864）、日本（1887）等相继推行；**第二次工业革命扩大了企业所得的潜在税基**，日本 1899 年对法人所得独立开征，美国 1909 年以“经营特权消费税”名义开征企业所得税，随后战争加速了企业所得税在全球的推广；**互联网革命推动消费税征管制度不断完善**，1998 年渥太华会议形成全球性多边协调框架，2013 年 G20/OECD 启动 BEPS 15 项行动计划，2021 年 BEPS 包容性框架下 130 余个辖区达成双支柱国际税改共识。
- **AI 如何影响三大税基？AI 对劳动税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岗位收缩与工资分化。**Acemoglu & Restrepo（2020、2022）测算美国每千名工人新增 1 个机器人对应就业人口比下降 0.18-0.34 个百分点、工资下降 0.25%-0.5%。Challenger, Gray & Christmas 数据显示，今年 1-8 月美国已有 10 万多例裁员公告提及 AI 因素，占比超 20%。**AI 或将减弱资本税基的可课税性。**AI 产业链的算力层面临折旧规则争议，数据层面临计量困境，模型层面临定价困难，应用层在税收来源地认定、劳务与营业利润区分、扣缴义务配置和消费地课税上出现适用缺口。此外，现行税制的非中性，有可能放大 AI 对税收的冲击。**消费税基也将面临 AI 带来的结构性弱化**，工薪是居民消费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AI 沿岗位收缩与工资承压两条链路压缩居民收入，间接影响消费税基；此外 AI 支持消费者自产内容替代原有外部采购，叠加订阅共享、预充值按量消费、API 多层转调用等模式，放大税基遗漏、计量困难与纳税时间错配问题。
- **哪些国家的税收更容易受到冲击？**以劳动税基为重点，本文构建了**高 AI 暴露职业的就业份额、劳动份额、劳动税依赖度、财政脆弱度**四个维度测度的综合风险敞口。**从 AI 暴露度看**，发达经济体兼具较高 AI 就绪度与高暴露岗位占比，劳动税基面临更大潜在替代风险；新兴市场 AI 就绪度偏低，高 AI 暴露岗位就业占比普遍更低。**从劳动份额与劳动税依赖度看**，西欧、北欧发达经济体（德国、法国、奥地利、芬兰、西班牙等）劳动报酬占 GDP 55%以上，且总税收里一半以上来自劳动相关税收。**从财政脆弱度看，**样本国家

相关报告

1、《新旧动能切换走向深入—显微镜下的中国经济（2026 年第 36 期）》2026-09-21
2、《关注新一轮中美经贸磋商——国际时政周评》2026-09-20
3、《黄金配置价值依然存在—显微镜下的中国经济（2026 年第 35 期）》2026-09-14

张静静 S1090522050003
zhangjingjing@cmschina.com.cn
陈莹 S1090526020001
chenying14@cmschina.com.cn

下载日志已记录，仅供内部参考

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是日本、希腊、意大利、美国、法国，其中日本的压力主要来自极高的广义债务负担率与老年抚养比。**综合来看**，德国、美国、日本综合风险敞口最高，瑞典、芬兰、法国、加拿大处于较高区间，新兴市场国家综合冲击强度明显更小。需要说明的是，本指标为静态截面测度，仅用于识别潜在风险敞口，不代表 AI 冲击必然引发财政危机。

- **如何应对 AI 对税收的冲击？**面对 AI 技术带来的潜在税收冲击，目前学界与政策层面围绕税制调整路径形成两类主流思路。**一是**，新增税种（机器人税），Guerreiro、Rebelo 与 Teles（2021）指出技能固化、难以转岗的劳动者仍在职期间，对机器人征税为最优政策；Thuemmel（2019）证明美国最优机器人税率为正。不过，反对方认为机器人税可能会抑制创新，此外机器人本身不具备纳税主体资格。**二是**，在现有框架内进行规则优化。欧盟 2022 年 12 月 14 日通过的理事会指令（EU）2022/2523 确立 15%全球最低有效税率，自 2024 年起在主要辖区适用，构成对大型跨国企业（含数字与 AI 企业）利润的间接课税。
- **现有框架内的规则优化更符合当下现实。**第一次工业革命至 1842 年英国率先推行所得税、第二次工业革命至 1899 年日本独立开征企业所得税、互联网革命至 1998 年渥太华会议，税制回应滞后时间从 80 余年缩短至 30 年左右、再至约 10 年。但税制变革的触发因素并非单纯由技术冲击驱动。关键在于 AI 是否引发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根本性转变。回顾历史，社会财富重心从土地所有者转向工薪劳动者，再转向企业资本所得，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新税种拓展了税基基础；但新税种落地，往往仍需要财政压力等外部催化剂。一国单独推出针对 AI 的全新结构性税种易引发跨境税基外流，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财政压力较大的美欧等国会推动新税种的开辟，全球统一的改革阻力亦较大。当前看，推动税制中性化、优化收入结构、降低财政对工资总额的单一依赖、参与数据要素与跨境数字服务规则制定等现有框架内的规则优化更符合当下现实。
- **风险提示：1）AI 冲击劳动税基的方向与幅度存在双向不确定性；2）静态截面测度存在方法与数据局限；3）制度与政策变量可能改变等。**

下载日志已记录，仅供内部参考

正文目录

一、 AI 如何冲击税收？ 4
1.1 历次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税收？ 4
1.2 AI 如何影响三大税基？ 6
二、 哪些国家的税收更容易受到冲击？ 9
三、 如何应对 AI 对税收的冲击？ 13

图表目录

图 1 2023 年 OECD 国家与我国税费结构对比 4
图 2 欧洲各国个人所得税开征时点 5
图 3 税收与日本企业组织形式选择 5
图 4 美国联邦公司所得税法定税率 6
图 5 2026 年 1-8 月美国企业公告裁员的前十大原因 7
图 6 AI 沿技术链条对资本税基的冲击 7
图 7 不同工资与股息收入组合下个人的有效税率 8
图 8 AI 渗透率与宏观税负正向相关 9
图 9 印尼、哥伦比亚、挪威等资源型国家的企业所得税依赖度较高 10
图 10 AIPI 与高 AI 暴露度职业就业份额基本正相关 10
图 11 整体看劳动份额越高，对劳动税的依赖度越高 11
图 12 样本财政脆弱度前五的国家 12
图 13 AI 对劳动的冲击或给德国、美国和日本带来较大财政风险敞口 13
图 14 2018 年韩国自动化税收抵免下调改革对企业就业的动态处理效应 14
图 15 三次工业革命与税制回应时间轴 14

下载日志已记录，仅供内部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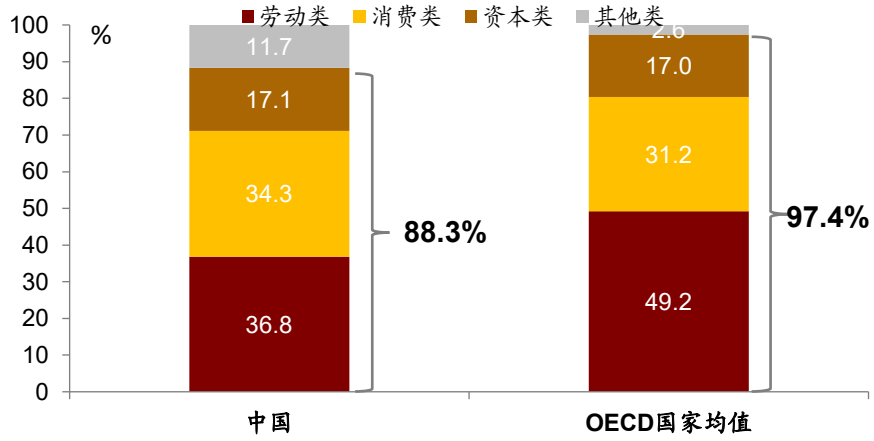
一、AI 如何冲击税收？

要分析 AI 对税收体系的冲击，首先需厘清现代税收体系的底层结构。

劳动、资本和消费构成现代财税体系的三大税基。2023 年 OECD 国家平均劳动类税收占比 49.2%、消费类税收占比 31.2%、资本类税收占比 17%，三者合计占比达到 97.4%。同期，若将社会保险费并入考虑，同口径下我国劳动类税收占比约 36.8%，明显低于 OECD 国家均值；消费类占比约 34.3%，资本类占比约 17.1%，与 OECD 国家均值相当，三大税基占比约 88.3%。

AI 作为新一轮通用技术变革的代表，会如何冲击现行税收体制？立足三大税基基本格局，下文将基于现有文献，梳理历史几轮技术进步对税收体系的扰动以及 AI 对三大税基的冲击。

图 1 2023 年 OECD 国家与我国税费结构对比



资料来源：财政部、OECD Revenue Statistics 2025、招商证券，口径规则：劳动类=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缴费；消费类=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关税-出口退税；资本类=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其他类=其余各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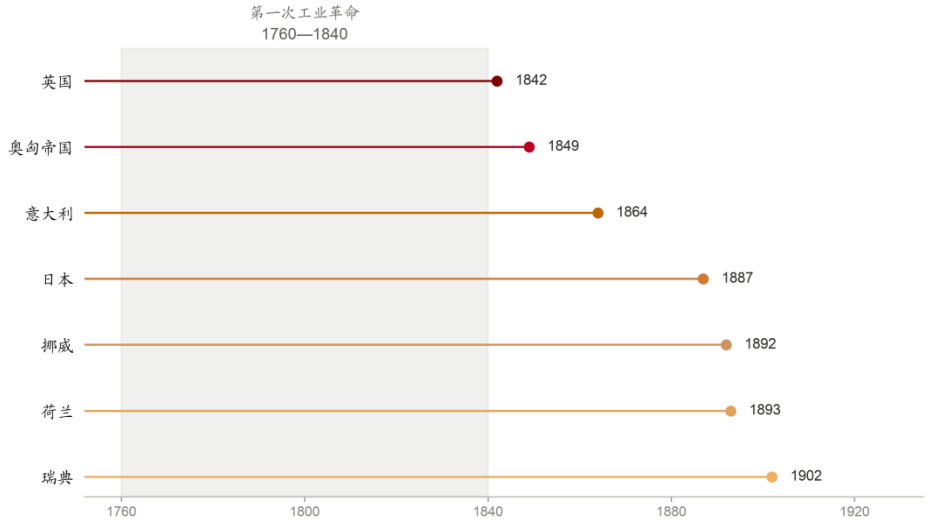
1.1 历次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税收？

如果把 AI 视作新一轮具有变革性的通用技术浪潮，那么历次技术革命重塑税收体系的经验，将是理解当前时代变化的重要历史参照。

第一次工业革命拓展了个人所得的潜在税基。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机器大生产让工业利润规模扩大、工薪劳动逐渐成为主流市场化收入形式。而前近代税制限于土地与不动产税、消费税及贸易税，没有触及快速增长的工业部门（Mares & Queralt, 2019[1]）。1842 年，英国的土地精英凭借政治优势推动所得税最先推行（Mares & Queralt, 2015[2]）。此后，奥地利（1849 年）、意大利（1864 年）、日本（1887 年）、挪威（1892 年）、荷兰（1893 年）、瑞典（1902 年）等国家相继推行所得税（Mares & Queralt, 2015[2]）。

下载日志已记录，仅供内部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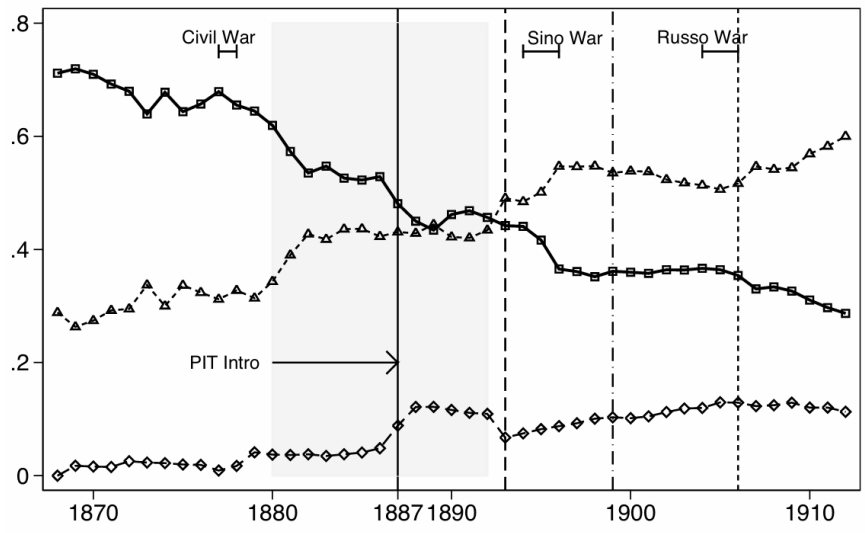
图 2 欧洲各国个人所得税开征时点



资料来源：Mares & Queralt（2015）[2]、招商证券

第二次工业革命扩大了企业所得的潜在税基。第二次工业革命让铁路、钢铁等资本密集产业迎来大发展，股份制企业逐渐增多，法人逐渐成为财富集聚的重要载体。不过第二次工业革命虽然发源于欧美，但最先对法人所得独立开征所得税的却是日本。1887 年日本开征个税时，为保护弱小近代产业将法人所得排除在税基之外，但这一制度反而诱导富人以法人形态避税，1880-1892 年间，日本个人所得税的推出使得法人企业占比提升超 3 个百分点（Onji & Tang, 2017[3]）。随着工商业的壮大，1899 年日本进行了税制改革，将法人所得列为第一类所得（Onji & Tang, 2017[3]）。而美国则是在 1909 年才以“经营特权消费税”名义开征企业所得税（Avi-Yonah, 2004[4]）。

图 3 税收与日本企业组织形式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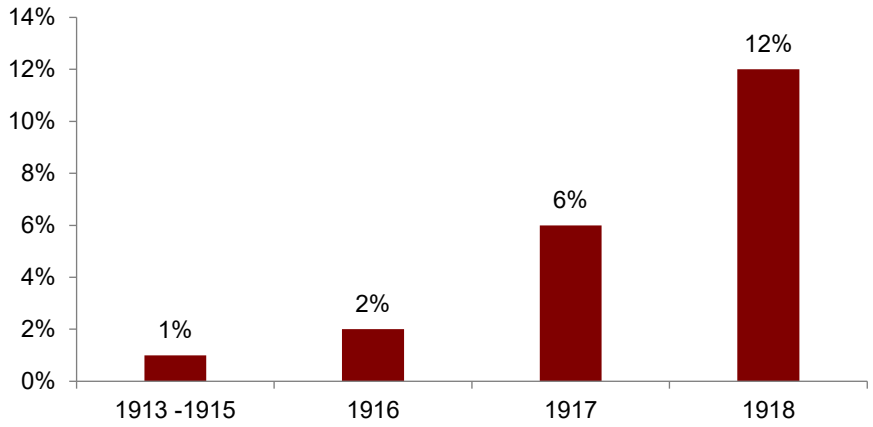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Onji & Tang, 2017[3]、招商证券

战争加速了企业所得税在全球的推广。1914 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参战各国政府承受了较大的财政压力，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企业所得税的普及。根据 IRS 数据，美国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自 1%（1913 年）升至 6%（1917 年）、12%（1918 年）；澳大利亚 1915 年为战争融资开征联邦所得税（Tilley,

下载日志已记录，仅供内部参考

2020[5]）；加拿大 1916 年通过《战时营业利润税法》，开始征收公司税；英属印度于 1917 年在企业已缴纳所得税的基础之上，对企业未分配利润加征“超额税（附加税）”（Pande, 1983[6]）。此后，公司所得税在全球相继落地，成为现代税制的常设组成部分。

图 4 美国联邦公司所得税法定税率



资料来源：IRS、招商证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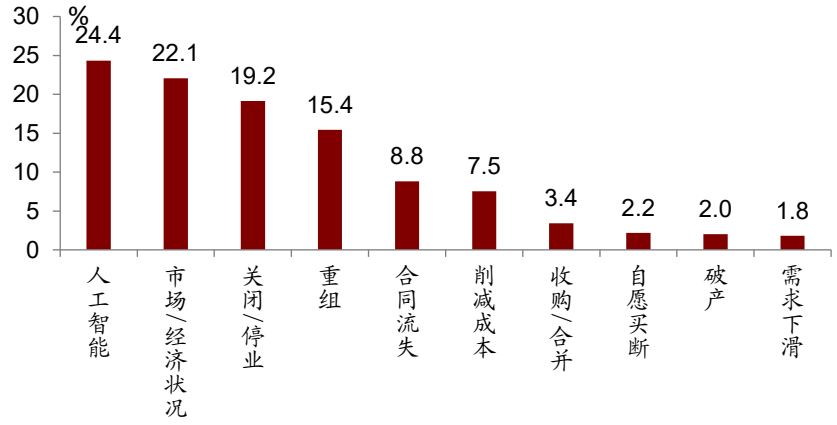
消费税征管制度在互联网革命的推动下不断完善。互联网技术使企业与个人消费者得以在全球范围内交易，而无需在买方所在国有任何实体存在（OECD, 2018[7]），征管链条由此在有形商品与服务两端同时断裂。**一方面，有形商品一端，**考虑到征管成本问题小额包裹通常免征增值税，但包裹量激增后造成税收流失与对境内零售商的不公平竞争，甚至激励境内供应商迁往离岸辖区避税（OECD, 2019[8]）。**另一方面，服务与无形资产一端，**缺乏有效的征收机制，境外卖家既无登记义务也无实体存在，税务机关缺乏可行的追缴手段（OECD, 2018、2019[7][8]; Agrawal & Fox, 2017[9]）。1998 年 OECD 渥太华电子商务会议确立跨境服务与无形资产适用消费地（目的地）增值税征税原则（OECD,2001[10]）；2013 年 G20/OECD 启动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15 项行动计划（OECD, 2013[11]）；2021 年，BEPS 包容性框架下 130 余个辖区达成双支柱国际税改共识（OECD, 2021[12]）。

1.2 AI 如何影响三大税基？

AI 对劳动税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岗位收缩与工资分化。Acemoglu & Restrepo（2020）[13]研究发现，美国每千名工人机器人数量每新增 1 个单位，就业人口比下降约 0.18 至 0.34 个百分点、工资下降 0.25%至 0.5%。Acemoglu & Restrepo（2022）[14]进一步估计，过去四十年来美国工资结构变动的 50%-70%，源于自动化快速发展行业中，从事常规任务的劳动者群体相对工资下滑。AI 技术或将进一步扩大自动化的领域，据 Eloundou et al.（2024）[15]测算，若可直接使用大模型，美国全部工作任务里约 15%能够在保持同等质量的前提下显著提速；若叠加基于大模型开发的各类软件与工具，该占比将提升至全部任务的 47%-56%。AI 对劳动的冲击已在发生，据 Challenger, Gray & Christmas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8 月份，今年已有 116175 例裁员公告提及 AI 因素，占比超 20%，是本年度累计裁员的首要原因。

下载日志已记录，仅供内部参考

图 5 2026 年 1-8 月美国企业公告裁员的前十大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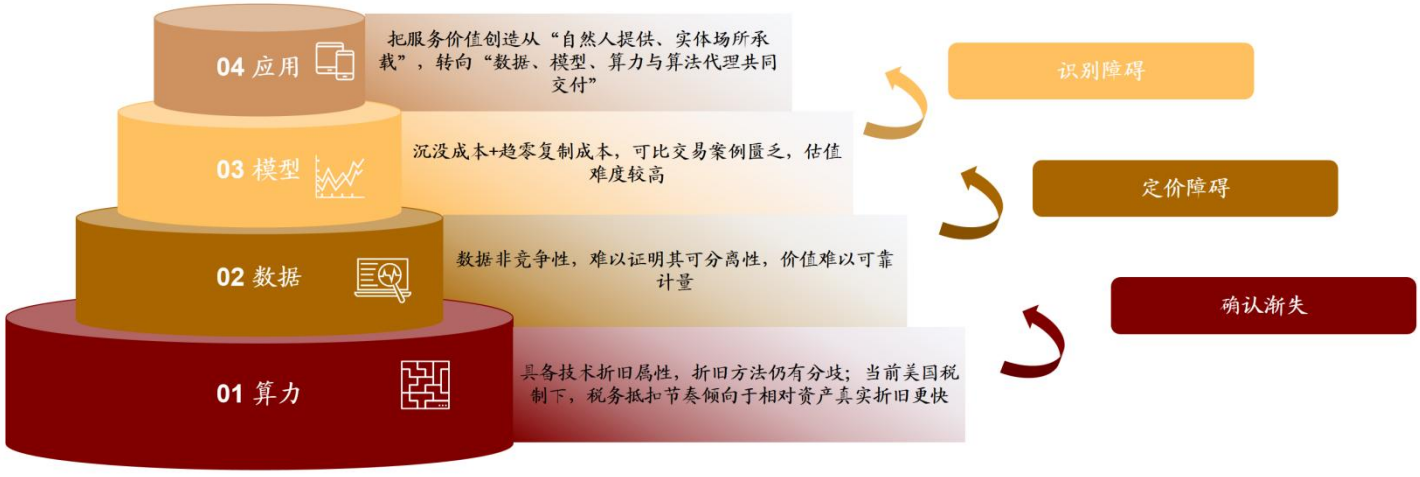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Challenger, Gray & Christmas、招商证券

AI 或将减弱资本税基的可课税性。AI 产业划分为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四个环节。**算力层的问题在于折旧规则。**芯片等高技术含量资产具备技术折旧属性，关于此类资产的折旧方法仍有分歧。在当前的美国税制之下，税务抵扣节奏倾向于相对资产真实折旧更快。算力资本开支持续扩张的背景下，持续新增的此类资产可能形成税盾。**数据层的核心难点在于计量问题。**数据具备非竞争、可无限复用而不损耗的特性（Jones & Tonetti, 2020[16]），其价值往往依附场景，很难证明其可分离性（Blycha et al. , 2026[17]），同时全球化又使得其生产、存储与使用的所在地相互割裂（Devereux & Vella, 2017[18]）。AI 发展放大了数据资产的经济价值，也进一步加剧了数据资产的计量困境。

再往上，模型层的障碍在定价，模型集巨额沉没成本与趋零复制成本于一身，是纯无形资产，可比交易案例匮乏，估值难度显著高于普通无形资产。**应用层的障碍在归属环节**，AI 应用把服务价值创造从“自然人提供、实体场所承载”，转向“数据、模型、算力与算法代理共同交付”。传统跨境征税规则多锚定自然人劳务发生地与常设机构，因而 AI 应用使得税收来源地认定、劳务与营业利润区分、扣缴义务配置和消费地课税上出现适用缺口。

图 6 AI 沿技术链条对资本税基的冲击



资料来源：Jones & Tonetti（2020）、Blycha et al.（2026）等，招商证券

此外，现行税制的非中性，有可能放大 AI 对税收的冲击。Acemoglu、Manera

下载日志已记录，仅供内部参考

与 Restrepo（2020）[13]认为美国税制存在偏袒资本、歧视劳动的倾向，且近年来这种倾向进一步加剧。全球范围内来看，税制对资本的偏袒现象也并非不普遍。除此之外，AI 可能会加剧就业碎片化现象，这将使税基从源泉扣缴退化为个人申报，Draghici（2023）[19]以平台劳动者为研究对象，发现他们普遍存在申报不足、最终税负偏低的问题。

图 7 不同工资与股息收入组合下个人的有效税率



资料来源：OECD《The taxation of labour vs. capital income: A focus on high earners》[20]，招商证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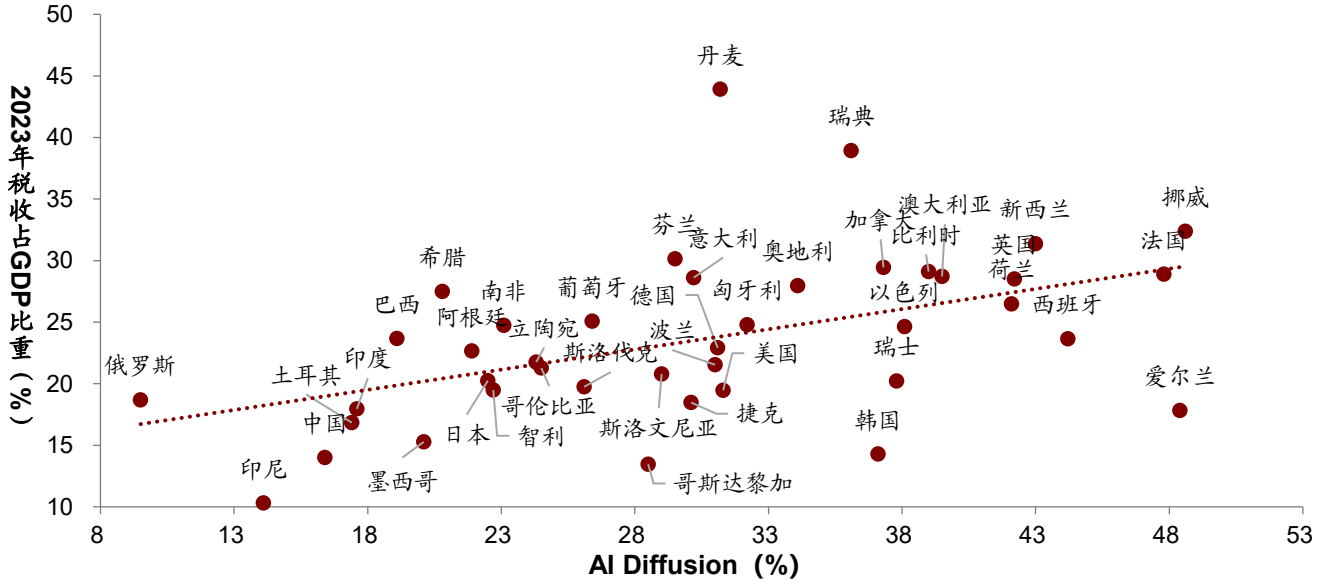
消费税基也将面临 AI 带来的结构性弱化。一方面，广义消费税基包含增值税与零售销售税，依托居民购买力与市场化付费消费形成税基支撑。工薪是居民消费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AI 沿岗位收缩与工资承压两条链路压缩居民收入（Benzell et al. ,2015[21]），间接影响消费税基。**另一方面，**AI 支持消费者自产内容替代原有外部采购，大量市场应税交易直接消失；叠加订阅共享、预充值按量消费、API 多层转调用等模式，或将放大税基遗漏、计量困难与纳税时间错配问题。

下载日志已记录，仅供内部参考

二、哪些国家的税收更容易受到冲击？

宏观税负与 AI 渗透率总体正相关。根据 Microsoft 的 AI Diffusion 数据，高 AI 普及的国家集中在北欧、西欧发达国家（丹麦、瑞典、挪威、法国等），同时税收占 GDP 比重也处于全球高位；AI 渗透率偏低的国家多为新兴市场（印尼、俄罗斯、土耳其、印度、墨西哥等），同时宏观税负普遍更低。**高宏观税负国家未来的税收受 AI 冲击的风险或许更大，但并不绝对。**例如，爱尔兰 AI 扩散居全球前列但税负仅约 17.8%，低公司税率吸引跨国企业入驻，AI 反而可能增厚其资本税基，说明 **AI 对税收的冲击不是单一路径，制度是核心调节变量。**

图 8 AI 渗透率与宏观税负正向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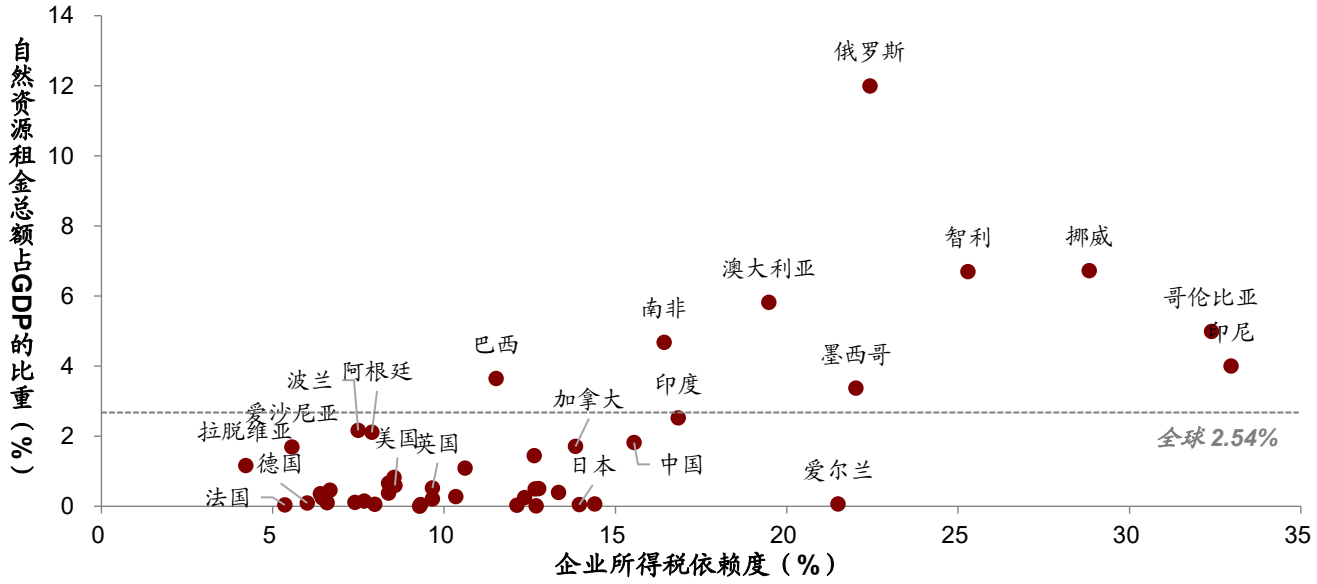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Microsoft、iFinD、招商证券，AI Diffusion 为 2026 年 Q1 数据，反映一国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中使用过生成式 AI 产品的人口占比，但无法反映使用深度；我们选取 OECD 和主要新兴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下同；受跨国长时序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采用 2023 年截面数据开展基准分析，下同。

高企业所得税依赖度的国家多为资源型国家。从税收的结构看，多数国家的企业所得税依赖度多在 15%以下，印尼、哥伦比亚、挪威等国财政对企业所得税依赖度最高，企业所得税占总税收比重超过 25%。但结合自然资源租金总额占 GDO 比重来看，这些高企业所得税依赖国家，多为资源型国家。从这个角度上看，AI 带来的资本税基冲击或许有限。因此下文，我们主要对劳动税基进行分析。

下载日志已记录，仅供内部参考

图 9 印尼、哥伦比亚、挪威等资源型国家的企业所得税依赖度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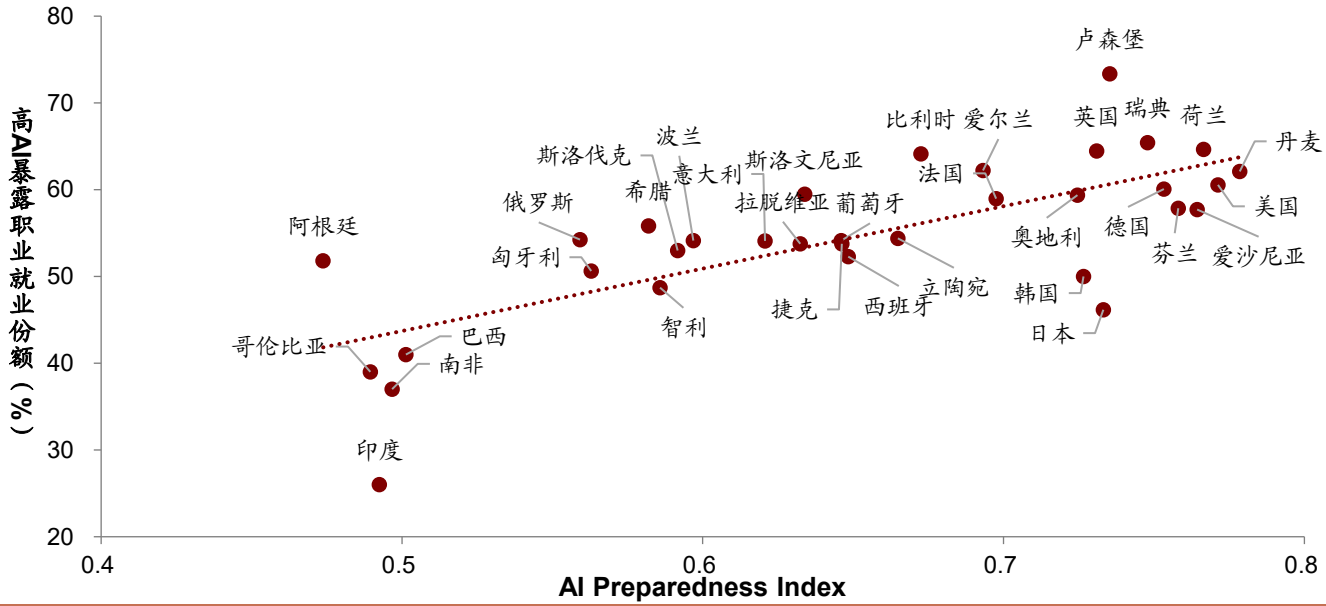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iFinD 等、招商证券，企业所得税依赖度为 2023 年数据；自然资源租金占 GDP 比重为 2012-2021 年均值

我们从高 AI 暴露职业就业份额、劳动份额、劳动税依赖度以及财政脆弱度这四个维度出发，衡量各国财政受 AI 劳动税基冲击的强度。

发达经济体高 AI 暴露职业的就业份额普遍较高。高 AI 暴露职业的就业份额反映一国劳动市场潜在的 AI 替代空间，但该数据的可得性有限，尤其是中国等重要国家数据缺失。不过，我们发现 AI Preparedness Index（AIPI，AI 就绪度指数）与高 AI 暴露职业的就业份额正相关，背后可能的原因是发达经济体本身的 AI 配套条件就更成熟，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的就业结构天然偏向知识密集岗位，而这类岗位本身 AI 暴露度较高。因此我们使用 AIPI 代替 AI 暴露度。此外，我们发现发达经济体兼具较高 AI 就绪度与高暴露岗位占比，劳动个税税基面临更大潜在替代风险；新兴市场 AI 就绪度偏低，高 AI 暴露岗位就业占比普遍更低。

图 10 AIPI 与高 AI 暴露度职业就业份额基本正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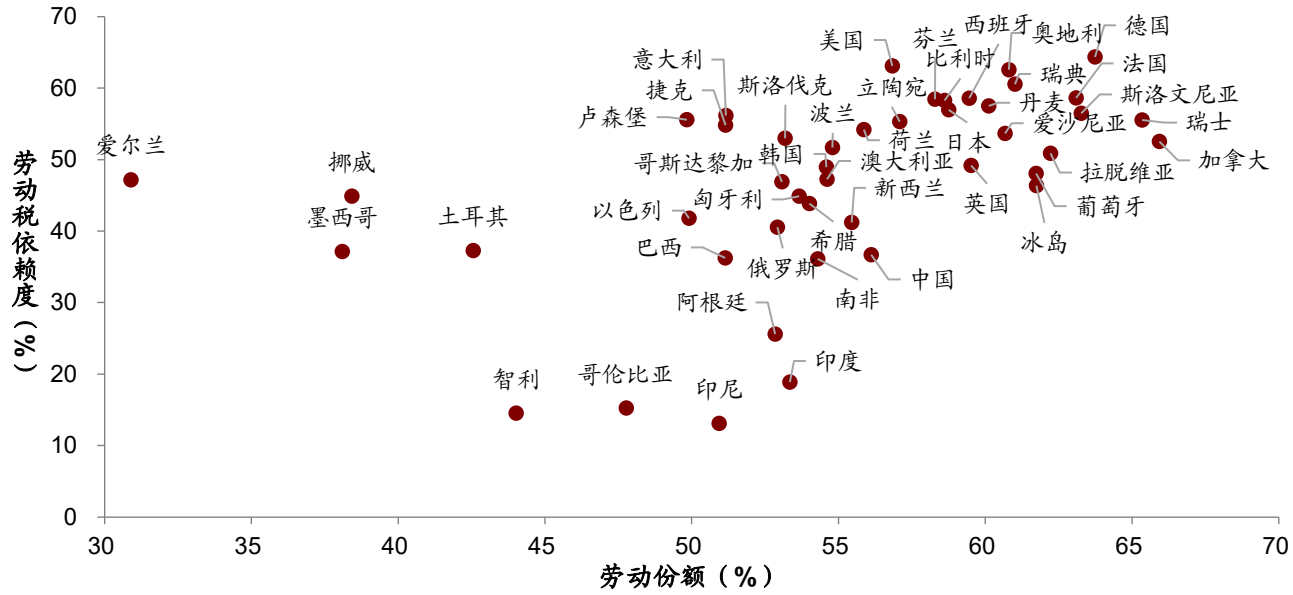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IMF、招商证券，AIPI 为 2023 年数据，AIPI 是四个关键维度的总和（数字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法律框架），这四个维度很可能对 AI 的顺利采用密切相关；高 AI 暴露职业就业份额数据来自 Mauro Cazzaniga et.al(2024)

下载日志已记录，仅供内部参考

劳动份额越高，普遍对劳动税的依赖也越大。仅仅劳动收入高，不等于税基脆弱，当税收高度依赖劳动收入时，AI 替代劳动才会产生明显冲击。从截面数据来看，基本上劳动份额越高，对应的收税对于劳动税的依赖就越大。其中，西欧、北欧发达经济体（德国、法国、奥地利、芬兰、西班牙等），劳动报酬占 GDP 大概 55%以上，同时总税收里一半以上来自劳动相关税收。爱尔兰仍旧是典型例外，其劳动收入份额受跨国资本影响被压低，但劳动税依赖度仍处于较高水平，AI 对税基的冲击路径区别于北欧其他国家。

图 11 整体看劳动份额越高，对劳动税的依赖度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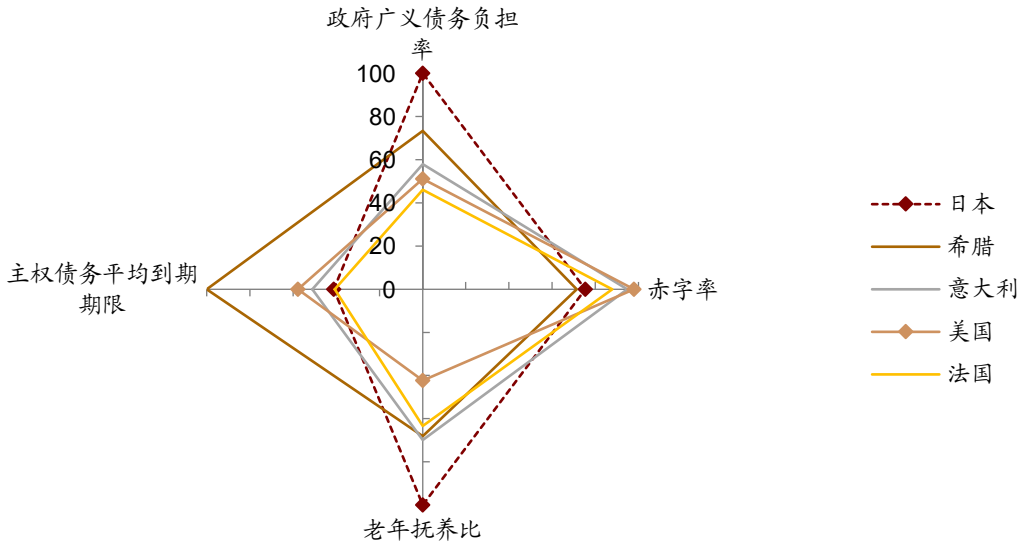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PTW 11.0、OECD、iFinD、招商证券，劳动份额即劳动者报酬占 GDP 比重，为 2023 年数据；劳动税依赖度=（个人所得税+社保缴费+工资和劳动税）/总税收（含社保缴费），为 2023 年数据，其中印度数据不含社保缴费

日本、希腊、意大利、美国和法国的财政脆弱度或较高。进一步构建财政脆弱度指标，从政府广义债务负担率、财政赤字率、老年抚养比、主权债务平均到期期限四个维度评估各国财政体系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指标经归一化后取均值。政府债务率越高、赤字率越高、老年抚养比越高、主权债务平均到期期限越短，财政脆弱度越高。从最终结果来看，日本、希腊、意大利、美国和法国在本文的测度下，存在较高的财政脆弱度。其中，日本的财政压力主要来自极高的广义债务负担率与老年抚养比；希腊风险集中在较短的主权债务到期期限，叠加较高的政府债务水平；意大利、美国、法国则主要由偏高的财政赤字推升脆弱度。不过需要说明，本指标为静态截面测度，仅用于识别潜在风险敞口，不代表 AI 冲击必然引发财政危机。

下载日志已记录，仅供内部参考

图 12 样本财政脆弱度前五的国家



资料来源：iFinD、世界银行、招商证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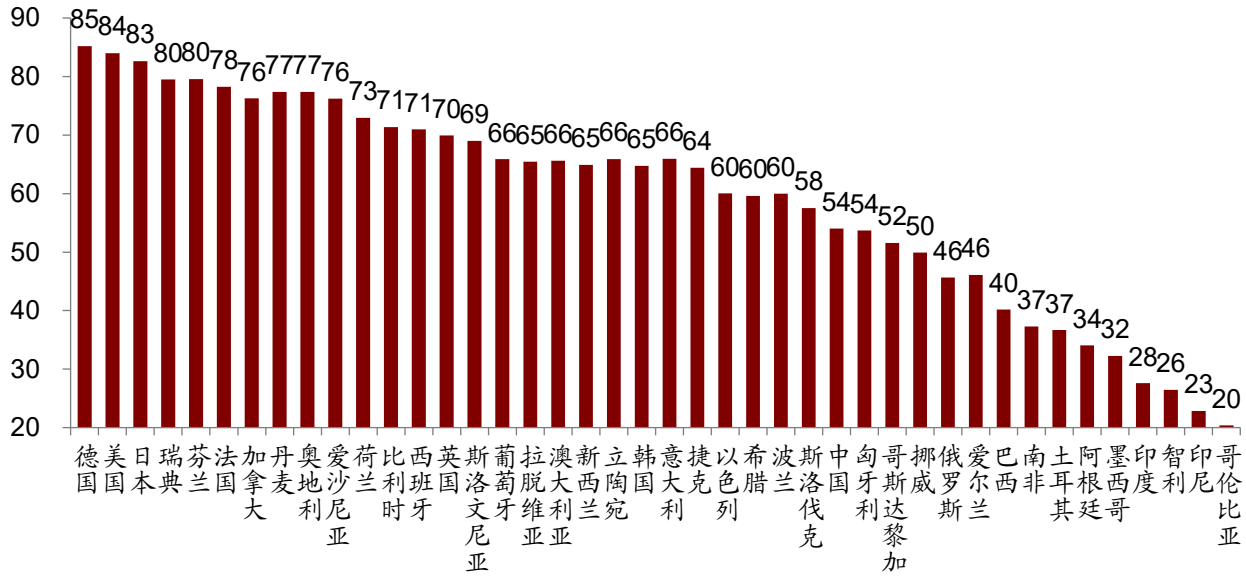
AI 劳动冲击给财政带来的影响不是单一因素决定。AI 替代岗位的潜力决定潜在税基损失规模，而一国税制结构、国民收入分配、财政可持续性共同决定冲击最终会转化为多大的财政压力。在分别识别 AI 岗位暴露、劳动收入分配、税制结构、财政抗冲击能力四个单项维度之后，本文构建综合指数衡量 AI 对劳动税基的冲击强度。将四项指标归一化后加权合成，权重设定为 AI 暴露度 0.25、劳动份额 0.20、劳动税依赖度 0.30、财政脆弱度 0.25。

本文测度下，德国、美国、日本的综合风险敞口最高，瑞典、芬兰、法国、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也处于较高区间。这类经济体普遍具备高 AI 岗位暴露、高劳动收入份额、税收高度依赖劳动个税与社保缴款，同时财政债务、赤字、老龄化带来的脆弱性进一步放大冲击后果。而新兴市场国家，四项分项指标均偏低，AI 对劳动税基的综合冲击强度明显更小。需要说明的是，该合成指数的权重设置带有主观性，属于风险敞口的静态情景测算，并非对未来税收损失的精确预测，另外受限于数据可得性，模型也没有纳入对冲机制，例如 AI 催生新岗位、劳动力跨行业再就业等因素。



下载日志已记录，仅供内部参考

图 13 AI 对劳动的冲击或给德国、美国和日本带来较大财政风险敞口



资料来源：IMF、世界银行、PWT、iFinD 等、招商证券

三、如何应对 AI 对税收的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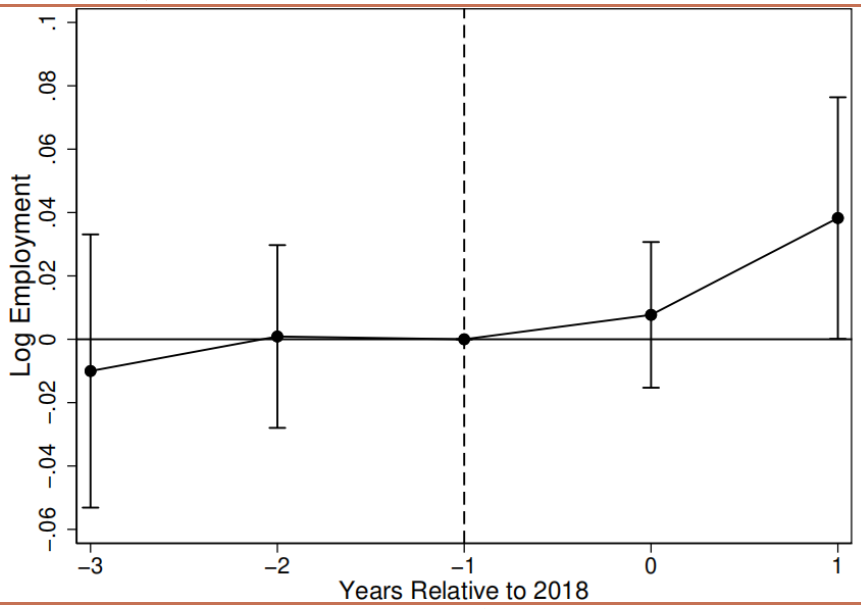
面对 AI 技术带来的潜在税收冲击，目前学界与政策层面围绕税制调整路径形成两类主流思路。

一是，新增税种——如“机器人税”。Oberson（2019、2024）[22][23]提出了对机器人征税，可以作为应对 AI 冲击下预期税收减少问题的可能方案。Guerreiro、Rebelo 与 Teles（2021）[24]研究指出在当前技能固化、难以转岗的劳动者仍在职期间，对机器人征税为最优政策。更进一步地，Thuemmel（2019）[25]在研究机器人与劳动收入的最优税收问题时证明，美国的最优机器人税率为正，且能带来小幅社会福利改善。不过，当前反对和质疑征收机器人税的声音也不在少数。2017 年，欧洲议会否决了征收“机器人税”的提案，理由是担心此举会抑制创新（Kistnasamy et al. ,2026[26]）。Abbott 与 Bogenschneider（2018）[27]指出，机器人本身不具备纳税主体资格，税制调整应该在劳动者和机器人之间保持中性。

目前还没有真正的机器人税出现，最接近的案例是韩国对自动化设备的“优惠退坡”。2018 年韩国缩减了自动化设备投资的税收抵免，从而增加了投资机器人的税收成本，类似于机器人税（Holtmann et al.,2025[28]）。实测结果显示，受政策影响韩国企业减少了机器人投资，增加了雇佣（Kang, Lee & Quach,2024[29]）。但是，Holtmann 等（2025）[28]认为增加雇佣的结论是存在异质性的，只有财务不受约束的韩国大企业才出现了“减少机器人、增雇工人”。

下载日志已记录，仅供内部参考

图 14 2018 年韩国自动化税收抵免下调改革对企业就业的动态处理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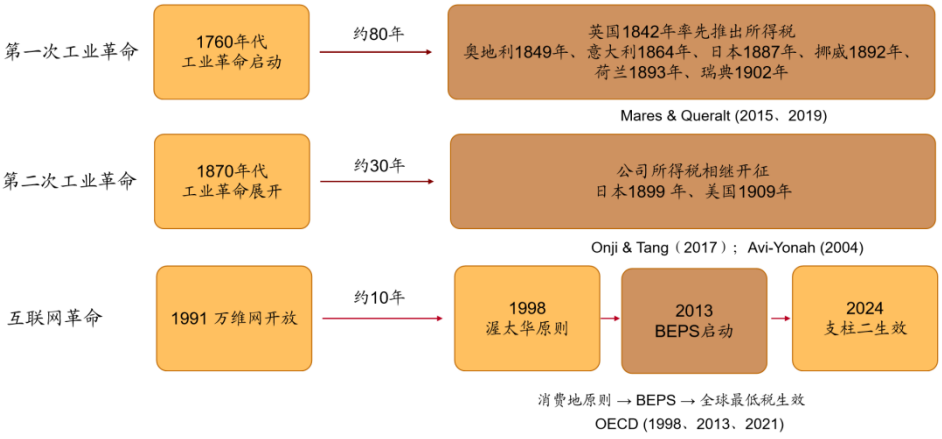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Kang, Lee & Quach（2024）[29]、招商证券，基准营收为 500-2000 亿韩元企业

二是，在现有税制框架内进行规则优化。2017 年 2 月，欧洲议会通过《Civil Law Rules on Robotics》，为机器人、人工智能的发展补齐民事法律、伦理、责任规则，应对自动化带来社会冲击。此后欧盟的着力点转向两个方向：一是人工智能监管立法，二是跨境利润课税。2022 年 12 月 14 日通过的理事会指令（EU）2022/2523 确立了 15%的全球最低有效税率，自 2024 年起在主要辖区适用，构成对大型跨国企业（包括数字与 AI 企业）利润的间接课税。这类工具都不以“AI”命名，却实际改变了 AI 相关经济活动的税负。

总结前文，面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冲击，税制回应始终滞后，但滞后时间不断缩短。第一次工业革命至 1842 年英国率先推行所得税，时隔 80 多年；第二次工业革命至 1899 年日本独立开征企业所得税，时隔 30 年左右；互联网革命至 1998 年渥太华会议形成全球性多边协调框架，滞后约 10 年。但税制变革的触发因素混杂技术、战争、财政危机，并非单纯由技术冲击驱动。关键在于 AI 是否引发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根本性转变。**回顾历史，社会财富重心从土地所有者转向工薪劳动者，再转向企业资本所得，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新税种拓展了税基基础；但新税种落地，往往仍需要财政压力等外部催化剂**。

图 15 三次工业革命与税制回应时间轴



资料来源：招商证券，根据前文总结

下载日志已记录，仅供内部参考

现有框架内的规则优化更符合当下现实。如果 AI 推动财富分配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当前全球化与大国产业竞争背景下，税制改革依然面临较强约束。一国单独推出针对 AI 的全新结构性税种，容易引发算力、企业主体跨境外流，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财政压力较大的美欧等国会推动新税种的开辟。全球统一税制改革阻力重重，各国 AI 产业发展阶段差异巨大，市场国与来源国利益诉求分化，利益协调机制难以在短时间内达成。如果 AI 并未带来财富分配格局的根本变动，那么诞生新税种的可能性较低，**前瞻性适配改革有更大概率推进**，例如推动税制中性化，使资本与劳动的实际税负对称；优化收入结构，降低财政对工资总额的单一依赖；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在数据要素、跨境数字服务与最低税规则上保持主动等。

风险提示：

1）**AI 冲击劳动税基的方向与幅度存在双向不确定性。**本文测算未纳入 AI 催生新岗位、劳动力跨行业再就业等对冲机制。若增强型创新催生新任务的速度赶上自动化创新的侵蚀速度，且新就业以标准雇佣形态进入正规部门、被源泉扣缴体系覆盖，劳动税基将获得可观回补。

2）**静态截面测度存在方法与数据局限。**综合风险基于 2023 年截面数据构建，权重设定带有主观性，属风险敞口的静态情景测算而非精确预测。

3）**制度与政策变量可能改变**。AI 对税收的冲击并非单一路径，税制安排是核心调节变量，若各国税收政策发生改变，可能修正的结论判断。

参考文献：

[1] Mares, I., & Queralt, D. (2019).Fiscal Innovation in Nondemocratic Regimes. Working paper, February 2019.

[2] Mares I, Queralt D (2015). The Non-Democratic Origins of Income Taxation[J].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8(14), 1974–2009.

[3] ONJI K, TANG J P. Taxes and the choice of organizational form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Japan[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17, 77(2): 440-472.

[4] AVI-YONAH R S. Corporations, society, and the state: a defense of the corporate tax[J]. Virginia Law Review, 2004, 90(5): 1193-1255.

[5] TILLEY P. Early federation reviews and 1942 income tax unification[R]. Canberra: Tax and Transfer Policy Institute, Crawford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20: 5-7.

[6] PANDE D P. Corporate tax structure in India and corporate behaviour[D]. Raja Rammohunpur: University of North Bengal, 1983: 36-39.

[7] OECD (2018),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 – Interim Report 2018: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OECD/G20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Project,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s://doi.org/10.1787/9789264293083-en.

[8] OECD (2019), The Role of Digital Platforms in the Collection of VAT/GST on

下载日志已记录，仅供内部参考

Online Sales,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s://doi.org/10.1787/e0e2dd2d-en.
[9] AGRAWAL D R, FOX W F. Taxes in an e-commerce generation[J].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2017, 24(5): 903-926.
[10] OECD (2001), Taxation and Electronic Commerce: Implementing the Ottawa Taxation Framework Conditions,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s://doi.org/10.1787/9789264189799-en.
[11] OECD (2013), Action Plan on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s://doi.org/10.1787/9789264202719-en.
[12] OECD (2021), Statement on a Two-Pillar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OECD Publishing, Paris.
[13] ACEMOGLU D, RESTREPO P. Robots and jobs: 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0, 128(6): 2188-2244.
[14] ACEMOGLU D, RESTREPO P. Tasks, automation, and the rise in US wage inequality[J]. Econometrica, 2022, 90(5): 1973-2016.
[15] ELOUNDOU T, MANNING S, MISHKIN P, et al. GPTs are GPTs: labor market impact potential of LLMs[J]. Science, 2024, 384(6702): 1306-1308.
[16] JONES C I, TONETTI C. Nonrivalry and the economics of dat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0, 110(9): 2819-2858.
[17] BLYCHA N E, MYINT J, ARDEN D, et al. Pricing the unpriced asset: a standards-based method for valuing enterprise data under IAS 38 and IAS 2[EB/OL]. arXiv: 2606.22760, 2026.
[18] DEVEREUX M P, VELLA J. Implications of digitaliz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tax reform[M]//Digital revolutions in public finance.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7: 91-112.
[19] Draghici, A.-M. (2023). Tax compliance at a crossroads: a study into issues of tax policy, compliance and administr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ncome taxation of collaborative economy platform workers. [Doctoral Thesis, Maastricht University]. Maastricht University. https://doi.org/10.26481/dis.20230303ad
[20] Hourani, D. et al. (2023), “The taxation of labour vs. capital income: A focus on high earners”, OECD Taxation Working Papers, No. 65,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s://doi.org/10.1787/04f8d936-en.
[21] Seth G. Benzell, Laurence J. Kotlikoff, Guillermo LaGarda, and Jeffrey D. Sachs, "Robots Are Us: Some Economics of Human Replacement," NBER Working Paper 20941 (2015), https://doi.org/10.3386/w20941.
[22] Oberson X. Taxing Robots: Helping the Economy to Adapt to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9. https://doi.org/10.4337/9781788976527
[23] Oberson X. Tax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下载日志已记录，仅供内部参考

Publishing, 2024. https://doi.org/10.4337/9781035307555

[24] Joao Guerreiro, Sergio Rebelo, and Pedro Teles, "Should Robots be Taxed?," NBER Working Paper 23806 (2017), https://doi.org/10.3386/w23806.

[25] Thuemmel, Uwe, Optimal Taxation of Robots (2018). CESifo Working Paper No. 7317,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338646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3338646

[26] Kistnasamy, C., & Baldavoo, K. (2026). Robot taxation as a fiscal policy instrument for sustainable employment: A scoping review with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economies. Economics,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ility, 11(1), 173–191. https://doi.org/10.14254/jems.2026.11-1.10

[27] Abbott, Ryan Benjamin and Bogenschneider, Bret, Should Robots Pay Taxes? Tax Policy in the Age of Automation (March 13, 2017). Harvard Law & Policy Review, Vol. 12, 2018,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932483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2932483

[28] Holtmann, Svea & Braun, Anna-Sophie & Cho, Jae & Koch, Reinald & Langenmayr, Dominika, 2025. "Investment effects of a quasi-robot tax: Evidence from South Korea," arqus Discussion Papers in Quantitative Tax Research 308, arqus - Arbeitskreis Quantitative Steuerlehre.

[29] Kang, DongIk and Lee, Jung Hyuk and Quach, Simon, The Welfare Effects of a Robot Tax: Evidence from a Tax Credit for Automation Technologies in Korea (October 04, 2024).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5005128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5005128

下载日志已记录，仅供内部参考

分析师承诺

负责本研究报告的每一位证券分析师，在此申明，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分析师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或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投资评级定义

报告中所涉及的投资评级采用相对评级体系，基于报告发布日后 6-12 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当地市场基准指数的市场表现预期。其中， 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中国香港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美国市场以标普 500 指数为基准。 具体标准如下：

股票评级

强烈推荐：预期公司股价涨幅超基准指数 20%以上
增持：预期公司股价涨幅超基准指数 5-20%之间
中性：预期公司股价变动幅度相对基准指数介于±5%之间
减持：预期公司股价表现弱于基准指数 5%以上

行业评级

推荐：行业基本面向好，行业指数将跑赢基准指数
中性：行业基本面稳定，行业指数跟随基准指数
回避：行业基本面向淡，行业指数将跑输基准指数

重要声明

本报告由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编制。本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基于合法取得的信息，但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并不构成对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除法律或规则规定必须承担的责任外，本公司及其雇员不对使用本报告及其内容所引发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负任何责任。本公司或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所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业务服务。客户应当考虑到本公司可能存在可能影响本报告客观性的利益冲突。

本报告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保留所有权利。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引用或转载，否则，本公司将保留随时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